

基于语序类型学的汉语介词 和介词框架习得研究



非外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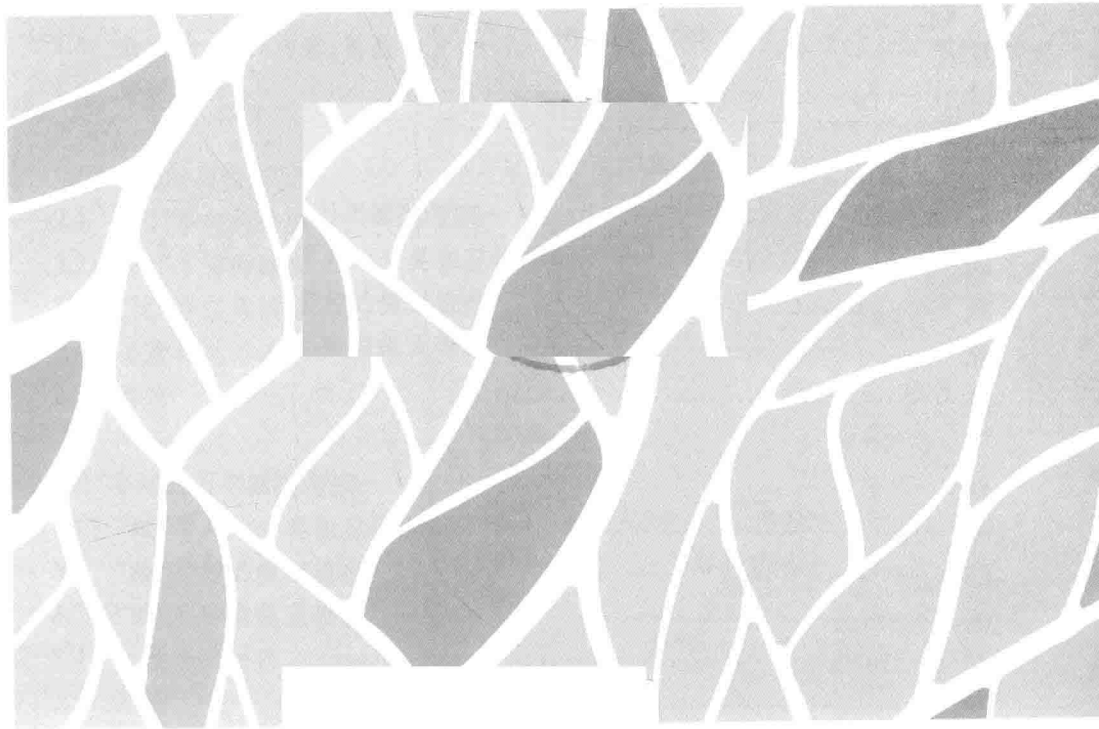
高顺全 著



学林出版社

基于语序类型学的汉语介词 和介词框架习得研究

高顺全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语序类型学的汉语介词和介词框架习得研究 /

高顺全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486-1554-5

I. ①基… II. ①高… III. ①汉语—介词—对外汉语

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7952 号

责任编辑 李晓梅

特约编辑 李保俊

封面设计 严克勤

基于语序类型学的汉语介词和介词框架习得研究

高顺全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54-5/H.118

定 价 62.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15YJA740007

目 录

1 绪论	1
1.1 题解	1
1.2 语序类型学和汉语语序类型	2
1.3 汉语和几种相关语言的介词类型与语序特征	5
1.4 语序类型学和二语习得研究	8
1.5 研究的对象、内容、思路和方法	11
1.6 语料说明	16
2 “比”字句的习得情况考察	18
2.1 “比”字句的分类及习得预测	18
2.2 “比”字句的输出情况	24
2.3 “比”字句式的偏误表现	28
2.4 习得情况讨论	38
2.5 余论	43
3 “给”字句的习得情况考察	45
3.1 “给”字句的分类和习得预测	46
3.2 “给”字句的输出情况	53
3.3 “给”字句的偏误表现	56
3.4 习得情况讨论	66
3.5 余论	68
4 “把”字句的习得情况考察	71
4.1 “把”字句的意义和句式分类	71
4.2 “把”字句的输出情况	80

4.3	“把”字句的偏误表现	87
4.4	习得情况讨论	99
4.5	余论	104
5	单音节后置介词的习得情况考察	106
5.1	“上”“里”“中”的用法分类和习得预测	106
5.2	“上”“里”“中”的输出情况	110
5.3	“上”“里”“中”的偏误表现	114
5.4	习得情况讨论	123
5.5	余论	126
6	名源后置词参与构成的介词框架的习得情况考察——以“在 X 上”为例	129
6.1	“在 X 上”的用法分类和习得预测	130
6.2	介词框架“在 X 上”的输出情况	132
6.3	“在 X 上”的偏误表现	134
6.4	习得情况讨论	141
6.5	余论	143
7	“从”类介词框架的习得情况考察	147
7.1	“从”类介词框架的分类和习得预测	147
7.2	“从”类介词框架的输出情况	150
7.3	“从”类介词框架的偏误表现	152
7.4	习得情况讨论	157
7.5	余论	159
8	观点类介词框架的习得情况考察	161
8.1	观点类介词框架的分类和习得预测	161
8.2	观点类介词框架的输出情况	166
8.3	观点类介词框架的偏误情况	169
8.4	观点类介词框架的习得情况	175
8.5	余论	177
9	结语	179
9.1	主要发现	179

9.2 习得预测与中介语事实	182
9.3 余论	184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90

1 绪 论

1.1 题 解

本书是笔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语序类型学的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习得研究》的结项成果。从项目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本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而非汉语本体研究,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介词和介词短语的习得情况,依托的理论则是语序类型学。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名词在和动词组合时,很多时候需要功能词介引,这种功能词叫附置词或旁置词(adposition),即一般理解的介词。介词是跟名词有关的功能词类,它可以置于名词之前,叫前置(介)词,即 preposition(简称 Pre.);也可以置于名词之后,叫后置(介)词,即 postposition(简称 Pos.)。跨语言的研究表明,有些语言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Pre. + N + Pos.”,这时名词前后各有一个介词,形成一个框架,即 circumposition(简称 CP)。就具体语言来说,很多语言要么只有前置词,要么只有后置词。而在汉语中,以上三种形式都有,只是在数量上存在差别。因此,本书所说的介词和介词短语,在未做说明的情况下包括以上三者以及它们和名词之间的句法组合。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点是学习者语言。从偏误分析到习得顺序研究,语法项目的习得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二语习得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就语言学层面来说,早期的学习者语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偏误分析,依托的理论是对比语言学;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中介语和习得顺序研究依托的则是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生成语法)理论。因此,以往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是两个路子:不分国别(语别)的研究和分国别(语别)的研究。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普遍语法,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是对比分析和语言迁移(母语迁移)。前者认为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某种目的语时所表现出来的偏误和习得顺序具有共性,后者则认为母语不同,由负迁移造成的偏误具有个性。

在我们看来,语序类型学可以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语言学方面的支撑理论,因为在二语习得方面,语言迁移的作用是存在的,但同一类型的不同语言在母语迁移方面可能存在共性。二语学习者在偏误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既与具体的母语语言迁移有关,也应该与其母语的言类型有关。偏误表现既有母语个性,也应该有类型共性。言类型的标记性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预测学习者的难点和偏误,开展语序类型导向的习得研究将会取得一些更有价值的结论。如果把言类型学作为基础理论,就可能为汉语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

认为,这应该是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特别是偏误分析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基于这种考虑,本书尝试把当代语言学的前沿和热点理论之一——语序类型学运用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项目习得研究中来。我们认为,语序类型学倾向于从语言应用和认知功能的角度对语言共性进行解释,而二语学习者在习得顺序和习得偏误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既与具体的母语语言迁移有关,也与母语的言类型有关。习得顺序和偏误表现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基于语序类型学的语法项目习得研究对习得共性能够做出预测,也能够做出解释。将语序类型学作为基础理论,通过跨语言比较概括出的语言共性可以为二语习得顺序研究提供依据;言类型的标记性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学习者的难点;学习者的语言可作为言类型学研究的样本,而二语习得过程可为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一个潜在的窗口。

之所以选择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的习得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是因为汉语的介词和介词短语在语序类型方面相较于世界其他语言来说极具特殊性(同时具有前置词、后置词和框式介词),是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不同母语的学习者在汉语介词二语习得方面有无共性和差异,倾向或规律如何,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相信,这种研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方面具有积极的理论导向价值和探索意义,研究结论和建议可直接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具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1.2 语序类型学和汉语语序类型

1.2.1 语序类型学简介

本书无意在语序类型学方面有所创新,但要把语序类型学作为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理论,就有必要对语序类型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国内很多汉语学者如沈家煊(1997)、陆丙甫(2009)、刘丹青(2003)和金立鑫(2012)等都在学汉语语序类型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下过功夫,下面的介绍参考了时贤们的研究。

言类型学最早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古典言类型学也称形态类型学。Greenberg(1966)开创了区别与形态类型学当代言类型学,其贡献在于把语序问题作为类型学的核心问题,这种类型学也因此被称为语序类型学。他通过跨语言的比较研究发现,表面上不相同的语言现象背后其实有许多共性,即不同语序之间存在蕴涵关系:如果一种语言有P现象,那么必有Q现象(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参见陆丙甫2009)。例如,“在形容词比较结构中,如果唯一的或可能交替的语序之一是‘基准词-标记-形容词’的话,那么这种语言是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的语序是‘形容词-标记-基准’,那么这种语言除了偶然出现的情况外,绝大多数是前置词语言”。(共性第22)

这种蕴涵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语序共性,蕴涵关系可以落实为“四缺一”的关系,它实际上也是在跨语言的比较中对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做出的限制。为了解释语序共性,Greenberg 提出了语序优势(dominance)和语序和谐(harmony)两个概念。前者指某种特定语序压倒其交替语序的优势,后者指不同语序规则之间的和谐或不和谐关系。所谓语序和谐性(也说“一致性”或“对应性”),是指不同结构的语序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例如,WX 总是跟 YZ 共存于一种语言,XW 则总是与 ZY 共存于一种语言。

Greenberg 特别重视两种语序:及物小句的几个基本成分(主语 S,宾语 O,动词 V)之间的相对语序和介词的语序。在他提出的 45 条共性中,与 S、V、O 有关的最多,有 15 条。这三个成分在理论上可以有 6 种组合,但实际上,属于 SOV 和 SVO 这两种语序的语言在数量上远多于属于其他语序的语言,居第三位的语序是 VSO,属于这种语序的语言也比另外三种语序的数量要多得多。后来,类型学家把这种考虑较多特征对语言进行整体上分类的类型学叫整体类型学(holistic typology),区分出来的是语种类型(language types),如是 SVO 语言还是 SOV 语言等。Greenberg 的语序共性显示,宾语作为类型参项比主语更有预测力,因此,Vennemann 和 W. Lehmann 等都认为可以忽略主语在语序类型学中的作用,如此,数量最多的三种语序类型即 SOV、SVO 和 VSO 就被简化为 VO 和 OV 两类,(参见刘丹青,2003)分别称为 VO 语言和 OV 语言。

在 Greenberg 的 45 条共性中,与介词有关的占第二位,有 7 条。Hawkins (1983)把介词类型提高到超过 S、O、V 的首要位置,作为语序类型的核心参项,认为介词类型作为参项比其他参项更有预测力。根据介词类型,可把人类语言分为前置词型语言和后置词型语言。这种只根据某一具体语言要素特征对语言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叫特征类型学,据此分出来的类型是语言特征类型(linguistic types)。相关研究发现,介词类型和动宾关系存在很强的和谐性。Dryer(1992)以 VO/OV 为基本参项,提出了新的有和谐/对应关系的配对语序,即 VO 语言和 OV 语言相反的语序,其中跟介词有关的有两项:一是前、后置词;二是介词短语相对于动词的语序——在 VO 语言中,介词在被支配名词之前,介词短语在动词之后;在 OV 中则正好相反。而且介词短语的语序是所有参项中与动宾结构语序对应关系最密切的,有着很强的共性。即 VO、Pre. 和 VPP(PP 指介词短语,下同)为和谐的一方,OV、Pos. 和 PPV 为和谐的另一方,这两大类型覆盖了绝大部分语言。不仅如此,这两种语序类型还蕴涵着其他组配关系,如比较结构中的形容词是在比较基准之前还是在比较基准之后,状语倾向于在动词之前还是在动词之后,关系从句在名词之前还是在名词之后等。这些相关的句法组合构成蕴含式的后项,即:若为 VO 型语言,则有一系列 X 的句法组合;若为 OV 型语言,则有一系列 -X 的句法组合。因为 X 和 -X 的数量足够,所以它们也构成了对前项的蕴含。因此,所有的 X 和 -X 后项也蕴含 VO 或 OV 语序类型。(金立鑫、于秀波,2012)类型学就是要发现

这种不同表现类型中的功能共性,即“万变不离其宗”的变化,或者说是寻找对个性变异共同限制,即差异中反映出来的共性。语序共性不仅表现在单一结构的语序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结构的语序和谐性上。

总之,当代类型学主张根据多个参项找出世界诸多语言之间的联系,通过多种语言的比较,用归纳法找出语言的共性,用语言的功能来解释共性,从而建立普遍适用的语言变异模式。其最重要的概念是蕴含共性,它能说明语言类型变异所受的普遍限制。跟蕴含共性相通的是标记性(markedness),它是指一个语法范畴的内部成员有的是有标记项,有的是无标记项。例如名词的“数”范畴,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这是跨语言调查得出的标记模式。用蕴含共性来表述就是: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复数不加标记,那么名词单数也不加标记。当代类型学的研究还发现,有无标记其实是个程度问题,标记模式可以用语法等级(grammatical hierarchy)这个概念进一步阐释。拿名词的“数”范畴来说,除了单数和复数的对立,有的语言还有“双数”“三数”等,因此,有无标记的程度也就相当于一个“语法等级”,即:单数>复数>双数>三数,这个等级表示,左边项的无标记程度高于右边项。不仅如此,标记性还跟范畴的典型性(prototype)相通。典型的名词是无标记名词,典型的动词是无标记动词。典型不典型也是程度问题,就跟有无标记是程度问题一样。(沈家煊,2009)

1.2.2 汉语语序类型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汉语语序的特殊性,因为汉语是类型学家(如 Dryer 等)提出的语序和谐性之 VO 语言中的唯一例外,是特例或者反例。

汉语在语序上究竟属于(S)VO 语言还是(S)OV 语言?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刘丹青(2003)把 Greenberg 语序共性中涉及介词的共性与汉语语言事实以及汉语学界的相关看法进行了整理对比,发现了汉语语序在类型学中的特殊性:汉语的 VO 语序与 PPV 语序不和谐、前置词为主与 VO 语序也不和谐。他据此认为汉语是摇摆不定的 SVO 语言。

金立鑫、于秀金(2012)以类型学中 VO-OV 语序类型相关的 15 对语法组配为参照,逐一考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序类型,结果发现,在 15 对相关语法组配中,汉语普通话存在 10 组语法组配,其中,4 组兼有 OV 和 VO 组配,3 组倾向于 OV 组配,3 组倾向于 VO 组配,因此,普通话中就以上句法组配的模式倾向上来看,OV 和 VO 大致均等,他们采用数量相对强弱不改变质量上的区别这一评判尺度,认为普通话属于一种 VO 和 OV 语序类型的混合语,是极弱的 VO 语言。

在金立鑫、于秀金(2012)考察的 10 组语法组配中,有 3 组与介词有关:

(1) 是前置词还是后置词。前后置词是类型学家们测量 VO 还是 OV 语序类型的最重要的参项。因为前后置词与 VO 或 OV 之间存在几乎是双向蕴含的充要条件关系。尽管不是绝对的双向蕴含,但该参项在语言类型学中具有相当高的权

重。VO 语言压倒性倾向使用前置词,OV 语言则压倒性倾向使用后置词,普通话中既有前置词,也有后置词,甚至有时在一个结构中前、后置词同时使用(当指框式介词或介词框架,笔者注)。汉语普通话前后置词混用的现象表明它具有 VO-OV 混合语序的特征。

(2) 附置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VO 语言明显的倾向是“动词+附置词短语”结构,即 VPP 语序;OV 语言明显的倾向是“附置词短语+动词”结构,即 PPV 语序。在普通话中,附置词短语既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即既有 PPV,也有 VPP,前者在数量上远超后者。如果从数量大小上来判断,该现象支持普通话倾向于 OV 语言的观点。金立鑫采用数量相对强弱不改变质量上的区别的评判尺度,认为在前后置词短语的位置分布上,普通话表现为混合语的属性,而不是倾向于 OV 语序。

(3) 比较基准和形容词之间的语序。比较句结构中的比较基准和形容词与 VO 或 OV 语言相关,它们在 VO 和 OV 语言中的组配模式分别是“形容词+比较基准”和“比较基准+形容词”。普通话中主要的比较结构是使用前置词“比”,但书面语中也有形容词之后用“于”“过”等标记词的情况。因此,在比较句内部成分的组配上,普通话依然表现为 OV 和 VO 的混合性。

本书中涉及的汉语指普通话,因为二语学习者学习的汉语一般是普通话。我们倾向于接受金立鑫、于秀金(2012)的研究结论,不过,我们觉得可以不用“混合型语言”这一说法,也许这样的表示更合适一些:普通话兼具 VO 语言和 OV 语言的语序特点,是很不典型的 VO 语言。

1.3 汉语和几种相关语言的介词类型与语序特征

1.3.1 汉语的介词类型和语序特征

汉语学界关于汉语介词的本体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比较系统的专书研究有范晓(1980)、金昌吉(1997)、傅雨贤等(1997)和陈昌来(2002,2014)等;以介词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更是数量众多,如赵淑华(1996)等,有专门的篇幅讲解介词的工具书如刘月华等(2001)。

在 21 世纪之前,国内汉语学界所说的介词一般指的都是前置介词。学者们主要根据语义功能或(名词的)语义格的角度对前置词进行分类,如把介词分为施事介词、受事介词、工具介词、对象介词、时空介词、方式依据介词、排除介词和原因目的等 8 类(傅雨贤等,1997),或者分为主事介词、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境事介词、凭事介词、因事介词、关事介词和比事介词等 8 类(陈昌来,2002)。为汉语二语教学服务的工具书《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刘月华等,2001)的分类则比较简单,只有 6

类：表示空间、表示时间、表示对象、表示依据、表示缘由和表示其他方面。齐沪扬(2006)的介词分类名义上也只有6类，不过内容有所不同：表时间、空间；表关涉对象，表原因、目的，表凭借、依据，表施事、受事和表排除。

从数量上看，汉语前置介词数量较多，刘月华等(2001)列举了50多个常用介词。其中以单音节居多，如“在”“从”“把”“被”“比”“给”“由”“对”等；双音节前置词也有，如“对于”“由于”“根据”“按照”等。

汉语语法学界一般把类似“桌子上”“房间里”中的“上”“里”等看作名词的次类，称为方位(名)词或处所/方所名词。海外有汉语学者称其为后置词。刘丹青(2002, 2003)接受后置词这一术语，认为从类型学的视角看，汉语是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他把后置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认为“-起”“-似的”等都是后置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类似“在X上”“对X来说”“从X开始”这样传统上称为介词结构的形式可以看作是Greenberg所说的circumposition，他翻译为“框式介词”，由前置词和后置词共同组成，如“在X上”中的“在”是前置词，“上”是后置词；“对X来说”中的“对”是前置词，“来说”是后置词。之后有不少学者如王世群(2016)等也使用这一术语。

陈昌来(2002, 2003)则将此类语言形式称为介词框架，他把类似“在X上”和“对X来说”中的“在”和“对”统一称作前部词，把其中的“上”和“来说”等统一称作后部词。他的主要理由是，汉语语法学界一般把preposition称为介词，很少使用前置词这一术语，也很少有后置词(postposition)这一说法，因此把“在……上”之类的格式称作介词也不合汉语的习惯。更重要的理由是，“上”和“来说”等不好笼统归入一类——他认为“来说”之类的是助词性质的成分，而前部词的介词身份是明确的，可以看作标记词，因此，他主张用前部词的词性来为这种结构形式命名。

我们认为，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汉语的一些单音节方位词的功能确实很像是某些语言中的后置词，它们的功能就是标记空间(处所)题元，而且具有黏着性，可以看作后置词。但是，像“对……来说”和“跟……一起”中的“来说”“一起”之类的成分能不能叫后置词，还值得怀疑。刘丹青(2003)也只是把它们称作辅助性后置词而不是题元后置词。认为它们不能独立用作题元标记，实际上是承认它们和“上”“里”之类的题元后置词不是一个性质。他根据句法特点把框式介词分为双重赋元框式介词(如“在……上”)、词汇性框式介词(如“对……来说”)、强化式框式介词(如“跟……一起”)和连接性框式介词(如“用……来”)四种，其中，只有第一类后置词具有标记题元的功能(且范域小于前置词，即前置词支配一个PosP)，第二类后置词有固定的题元意义但不能单独介引题元。这两类后置词的区别与其来源有关：前者来源于名词，后者来源于动词或动词性成分。至于后两类，看作后置词的理由并不充分，至少不容易为学界普遍接受。不过，正如刘丹青(2003)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框式介词/介词框架中的后置词比前置词有更大的句法强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后置词这一概念甚至适当扩大后置词的外延对汉语的介词研究和教

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出于上述考虑,本书把汉语介词的上述三种形式分别称为前置词、后置词和介词框架。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本书的后置词限定为传统所说的单音节方位词;其二,用“介词框架”而不用“框式介词”,是因为我们基本赞成陈昌来的观点。但本书把单音节方位词参与构成的介词框架如“在……上”中的“上”等称为后置词,而把其他介词框架如“对……来说”中的“来说”等称为后附词。这样做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只是因为我们觉得陈昌来“后部词”的叫法不能充分体现语序类型学的理念,而刘丹青“后置词”的叫法则把“框式介词”扩大化了。本书涉及的后附词主要是刘丹青(2003)所说的辅助性后置词。

普通话语序与介词参项相关的表现主要有:(1)既有前置词,也有后置词和介词框架/框式介词。但在数量上,前置词占据优势。(2)既有 PPV 语序,也有 VPP 语序,前者占压倒优势。(3)比较句的结构中,“比较基准+形容词”和“形容词+比较基准”两种语序都有,但前者占明显优势。

1.3.2 几种相关语言的介词类型和语序特征

本书打算把语序类型学作为基础理论考察不同母语学习者汉语介词的习得情况,就必须有意识地选择几种语言作为考察对象的母语。从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人数的角度来说,英语、日语和韩语这三种母语者人数最多,他们的中介语是当然的研究对象。第四种语言的选择则比较令人为难。我们在综合考虑之后,把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作为同一类型的语言进行考察,因为这三种语言同属一个语族,在语序类型方面差别不大,且学习者人数较多。

下面主要从这几种语言跟介词相关的语序特点的角度,对上述语言做一个粗略的介绍。

英语在形态上属于屈折语,是比较典型的 VO 语言,以往一般认为英语是前置词语言。席建国(2013)认为,英语前置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也有后置词如“or so”“as well”等,只是数量有限,且基本上都有相应语义功能的前置词。他还把英语中数量很少的结构如“from ... to ...”和“from ... on ...”之类看作框式介词。我们觉得,英语中的这类结构是两个前置词连用构成的框架,不是“前置词+后置词”框架,不能看作是框式介词(我们也不认为汉语的“从……到……”是框式介词)。在英语中,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是 VPP 占据绝对优势(不考虑 PP 在句首的情况);比较结构的语序则是“形容词+比较基准”。英语和汉语表示相同或者相似题元关系的前置介词在数量上并不对应,有些是英语多汉语少,如表示对象、原因、条件、排除、关涉等关系的;有些是英语少汉语多,如表示依据、方式和伴随关系的;有些则表现为数量相当,如表示时间和目的关系的;还有一些是英语有汉语无,如表示让步、态度和否定的;也有一些是汉语有而英语无的,如表示与事的“给/跟”和表示受事的“把”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典型的后置词和框式介

词,英语表示处所的前置词介词本身包含方位的意思,因此,英语中表示方所题元的“前置词+名词”的功能在汉语里需要前置词和表示空间关系的后置词(方位词)组合的介词框架表达。

法语和西班牙、意大利语在形态上都是屈折语,在语序类型上则是比较典型的VO语言和前置词型语言。根据曲辰(2012),法语符合OV语序的全部15个参项,介词基本上都是前置词,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全都是VPP(不考虑出现在句首位置的),比较结构的语序是“形容词+比较基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日语在形态上属于黏着语,在语序上是比较典型的OV语言。日语的介词后置于名词,介词短语则位于动词之前,属于PPV语序,比较结构则是“比较基准+形容词”语序。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的学校语法中,表示名词与动词之间关系的格标记一般被称作“格助词”,许多学者特别是持语言类型理念的学者则视之为后置词,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它们不是词,而是名词的构形后缀,应该叫“格形态”(参见彭广陆2009、盛文忠2014)。刘丹青(2008)也注意到日语中介词和格形态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他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间接题元标记才有可能被分析为后置词。他介绍了后置词区别于格形态的操作性:间接题元充当话题时一律保留后置词,在其后再加wa,如de-wa、kara-wa等。本书采取类型学的观点,把日语的格助词或格形态看作后置词。从形式上看,日语的后置词都成音节,单音节的如ni、de、e、to等,也有非单音节的,如kara。从数量上看,日语后置词(不包括复合的)数量不多,且具有多义性。

韩语在形态上属于黏着语,在语序上也是比较典型的OV语言。白莲花(2013)用Dryer的15对VO-OV语序参项对韩语语序进行了验证,发现满足OV语言参项的有13条,不存在满足VO语言的参项。因此,韩语也属于后置词型语言,介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语序是PPV,比较结构的语序也是“比较基准+形容词”。OV语言前面的附加成分往往会很长,很复杂,在没听到核心成分之前,很难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为了避免记忆负担,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复杂的语言成分用形态标记进行整合。(白莲花,2013)因此,韩语的后置词在某种程度上和日语的后置词很相像,也可以理解为格助词甚至是形态,且有时需要标记重复标引。本书采用类型学的观点,认为韩语的格助词是后置词。它们在数量上也不多,常用的只有10个左右,且大多表现出多义性或多功能。如汉语的“给/对/向/跟”在韩语里用一个形式,汉语的“朝/向/往”在韩语里也用一个标记表达。(黄玉花,2017)

1.4 语序类型学和二语习得研究

语言类型学通过跨语言的比较对人类语言的共性进行描写和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以及学习者获得语言的过程进行描

写和解释。同样是追求语言共性,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用来指导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类型学能不能和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互动呢?

类型学考察的最初都是人类的自然语言。学习者语言是不是自然语言?或者说,类型学可不可以把它纳入研究的范围?早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就注意到学习者语言是一个连续的、独立的、可观察到的动态语言系统,它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一种中介语(interlanguage, Selinker 1972)。Adjémian(1976)认为中介语也是自然语言,因为如果中介语不是语言系统,语言科学及其分析程序就无法对学习者的语言进行分析。如果假定中介语是自然语言,它必然像所有的自然语言一样,包含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如果中介语包含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必然遵从人类语言在结构上的一般限制,并因此可以通过语言手段进行分析。另外,中介语和自然语言在两方面具有平行性,一是它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系统,并因此可以通过语言理论工具进行描写;二是它们都可以用来实现人类进行交际的功能。Eckman(1984)曾通过已有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和试验,就中介语、自然语言和语言共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和检验,结果证明中介语没有违反自然语言的共性原则。(参见孙文访,2012)

尽管中介语不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也不是一种新的语言(中介语者也无法形成语言社团),但它确实具备自然语言的一些属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接触的结果,或者说,是目的语的语言变异形式。在类型学考察的人类语言中,有很多语言从历时上看也是因语言接触而导致的变异形式。因此,一些类型学家认为中介语也是类型学研究的对象,主张语言类型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互动,认为这种互动可以促进彼此的发展。Eckman(1977, 1991)、Comrie(1984)、Hawkins(1987)等都对语言共性和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讨论。Greenberg(1991)认为,中介语或第二语言在揭示人类语言能力的研究中与第一语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二者都可以为语言研究的总体目标提供重要的参照点。他特别强调可以将第二语言作为语言共性研究的语料来源,认为语言类型学中的语言共性不是抽象人脑的特性,而是在实际语言中进行的共性归纳,学习者语言属于类型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共性概括不能违背学习者语言中的事实。(参见王勇、周迎芳,2014)

20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也追求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其出发点是语言天赋说。这种共性指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是一些原则上的共性,用这种理论指导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最大成果就是发现了习得顺序。语言类型学也可以作为基础理论,通过跨语言比较概括出的语言共性也能够为二语习得顺序研究提供依据。而且就语言共性而言,蕴含共性在二语习得顺序的预测上更有意义。Hawkins提出的习得共性一致原则(Universal Consistency in Acquisition)认为,儿童语言与中介语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从共时语言现象概括出来的蕴含共性保持一致。他认为基于蕴含共性可以对习得的时间顺序进行预测,而且如果蕴含共

性对某一项目的习得顺序预测是成立的,就可以对某些特征的使用顺序、成功使用的数量与理解顺序、成功理解的数量进行预测。这样,蕴含共性就可以当作语言习得的预测器。(孙文访,2012)

语序类型学的核心概念“蕴涵关系”可以理解为难度关系。陆丙甫(2009)指出,关于“蕴涵”和“和谐”的本质,从常识和功能的角度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P现象蕴涵Q现象,是说有P必有Q,说明P现象比Q难发生。蕴涵关系实际上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P现象都发生了,更容易发生的Q现象自然也已经发生了。

语言类型学中的标记性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学习者的难点,因为学习者的难点不仅局限于母语和目的语的不同部分,还在于不同部分中是母语的标记性高还是目的语的标记性高。对学习者的学习难点的预测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领域之一,对比分析的初衷就是通过对比学习者的母语系统和目的语系统,预测学习者的难点和偏误类型。但由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可比性问题和“差异”等同于“难度”假设的局限,常常难以准确预测学习的难度。Eckman(1977)将语言类型的标记性与母语和目的语的不同点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标记差异假设(the 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这一假设是在对比分析假设的基础上,将学习者学习困难及其程度的预测与母语和目的语的类型标记及其程度联系起来。传统的对比分析仅仅依靠目的语和母语的不同来确定学习难点,标记差异假设则认为目的语和母语不同的部分不都是学习的难点,学习难点的确定关键要看两者不同的部分中哪一部分的标记程度更高,如果不同的部分中目的语的标记程度高于母语,则是学习的难点;如果不同的部分中目的语的标记程度低于母语,则不是学习的难点。标记差异假设对学习难度的解释和预测是:困难程度与标记难度成正比,标记程度越高的项目越难学。标记差异假设更多地关心学习者母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其假设包括:(1) L2中那些不同于L1且标记程度更高的区域,学习时会有困难;(2) L2中那些不同于L1且标记程度更高的区域,学习时其困难程度等于其标记程度;(3) L2中那些不同于L1且标记程度低于L1的区域,学习时不会有困难。

标记差异假设也就习得顺序和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做出了假设,内容包括:(1) 无标记形式或者标记程度低的形式习得,要先于有标记形式或者标记程度高的形式;(2) 习得顺序与语言特征的标记度有关,学习者往往首先掌握无标记的语言项目,然后才习得有标记的语言项目;(3) 学习者容易将无标记的母语特征迁移到目的语中,母语中有标记的成分则不容易发生迁移;(4) 目的语的形式为有标记时,学习者会迁移母语中的无标记形式;目的语为无标记时,学习者不会迁移母语中的有标记形式。也就是说,中介语更倾向表现为无标记形式。这可以从Hawkins(1984)的研究中得到解释:语序应当从语言应用(performance)的角度寻求解释,语序共性背后的成因是寻求语言操作的容易性,也就是降低语言结构的操作难度和复杂性。中介语倾向于表现为无标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二语学习者降低语言结构操作难度的结果。